

翁心钧等整理

# 翁文灏

## 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

### 文集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 翁文灏古人类学 与历史文化文集

翁心钧 等 整理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的翁文灏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所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他在 1952 年以费伦乔笔名所写的“北京市初期建设的要点”这一重要城市地质学的文章,以及翁先生与安特生等人讨论有关问题的信件,由李玉梅同志译成中文。第二部分是请吴新智院士、张森水教授、高星教授、杨海峰主任从当代古人类学、石器、史前考古学等方面最新的发现与发展诠释《文集》所作的论文,以及黄汲清院士对翁文灏先生对周口店工作及古人类研究的文章,和他对翁先生在地质科学方面研究的创新。第三部分是翁先生以前发表的与三篇论文论述有关的文章。第四部分是翁文灏先生的自然科学著作年表和年谱。

本《文集》的出版,不仅对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地质学和古人类学研究者,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科学普及工作者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翁心钧等整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0155-3

I. 翁… II. 翁… III. 古人类学-文集 IV. Q9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156 号

责任编辑:谢洪源 宋云华/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工作室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889 × 1194 1/32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7/8 插页:2

印数:1-1000

字数:324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 《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读后 (代序 1)

翁文灏先生(1889~1971)是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作为地质学的开拓者,他在科学和事业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强烈的爱国心鼓舞着他,从1938到1949这11年间,毅然“书生从政”<sup>[1]</sup>,经受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幻梦的破灭”<sup>[2]</sup>,恢复了“书生本色”<sup>[3]</sup>,坚决地脱离了旧政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翁文灏先生回到新中国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所作的科学论文。这个时期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转折时期。《文集》的题目可能使人有些不解,觉得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并非翁先生常谈的有关矿产资源的题目,莫非他的研究也有了改变?

是的,从这次新发表的“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和“旧史今识——远古—史前期”三篇论文和“北京市初期建设的要点”一文的内容和科学性以及其严谨的格式来看,都说明它们是严肃的科学论文而不是随笔性的著作。这就使我们想到,作者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把科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远景,所以称其论述为新研。在他完稿的50年后,在一个呼唤创新科学文化的今天,回顾半个世纪前,翁文灏先生从地质科学出发探索文化的努力,其客观效果确实是一种过去地质学家们没有一个人尝试过的创新。而这也正是需要今天地质学家们更多人去尝试的一个方向。

读了《文集》以后触发了我们许多思考。对这位曾经影响和还在影响中国地质科学历史的人物,让我们从中国地质科学史的

角度来思考这位真正的爱国者，这位自主的、创新的地质学实践家，和这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地质学家的这三个侧面来认识和理解科学与文化，以及这本《文集》和它的作者吧！

## 一、真正的爱国者

翁文灏先生曾以“诗言志”的形式于1953年作过一篇长诗“洄溯吟”<sup>[4]</sup>。诗中记述了他的一生。现从诗中摘录了各个时期所有叙述“自己思想”的句子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让我们看看翁先生是如何解剖他自己的吧！

他幼年时，即考中秀才颇有抱负

“平生自度差能冀，真理寻求学术推”；

青年时，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培养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

“破浪东归勤自勗，燕都专业植虹霓”；

主持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从事大量调查研究

“自问平生乐事秋，纵横禹甸作良游”；

对国家的地质做出科学理论概括，应用于矿产资源

“宗国究应图自主，邦人自认责非轻”；

壮年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地质工作经费冒危险，但仍不坠青云之志

“世方进展随年长，我岂因循终古潺”；

目睹国事日非、敌寇侵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而以“书生从政”

“自问才非济世佳，凭何救国作安排”；

对于前苏联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向往

“自惭未识崭新路，委屈随波逐浪寻”；

抗战时期，入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开发大后方，辅佐抗战，功不可没

“腹地顿添工业化，内迁自造绩堂皇”；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刻，预见胜利将临，更需奋发图强

“从知自力功方建，莫惮勤劳著祖鞭”；

功成何必在我，思念回归地质科学

“平生自度能知足，不敢宦途望太奢”；

求去不成，目睹国家“工业化幻梦的破灭”，仍对石油事业  
竭尽心力

“帝国范围求自主，向前猛进责非轻”；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心脱离旧政权，准备回归  
祖国

“问心自是忠邦国，溯迹深忧涉主权”；

回国以后，不失“书生本色”，展望人类未来，总结历史发  
展前景

“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sup>①</sup>，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sup>②</sup>”。

“洄溯吟”<sup>[4]</sup>是翁文灏先生一生的诗史。从这些诗句中不仅可以  
看到翁先生从幼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贯穿着独立自主、积极  
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毫无悲观失败的颓废情绪，而且从它可以  
看到一部中国地质科学史，同时它也是翁先生对祖国理解的思想  
史。其中包含着他对自已的学问和自已科学工作成绩的自信与自  
省。他清醒地看到祖国的变革与进步，并对它有一个真正科学的  
理解。而这种理解才是对祖国的真正的爱。所以他得以超越“宦  
海浮沉”的境界，脱离了个人得失，以科学史观作为自己的人生  
观和归宿。

---

① 见本《文集》1~30页。

② 见本《文集》31~71页和72~108页。

## 二、自主创新的地质学实践家

翁文灏先生作为地质学先行者的一生，在地质科学本身有许多杰出的研究，如在结晶矿物学、岩石学、材料学、矿床学、能源燃料学、构造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地震学，以及地貌学、地理学和地图学等方面都有许多首创性的研究，对中国地质学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这可以从他的各种论文、传记和著作目录中知道。对此需要另做专门研究。在这方面黄汲清先生于1987年在为《翁文灏选集》<sup>[5]</sup>写的“序言”中有一精彩的评述，已收录在《文集》中，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翁文灏先生不仅是一位极富开拓思想的地质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能做到自主创新并能付之于实践的地质学家。仅在地质调查所的范围之内，他因为中国地震严重而研究地震并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新的鹫峰地震台；他看到中国燃料的发展远景建立了新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他对中国农业高瞻远瞩地建立了新的土壤研究室；他为了赋予中国山脉河流以新的科学认识而编制出版了新的《申报地图集》；他认识到了人类起源研究在中国的重要性首创了中国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所有这些单位和学科都在后来发展与壮大起来成为国际上承认的、一流的、独立的研究单位，和国家的重要建设部门，并构建为中国地球科学的基础。

在发展地质事业过程中值得称赞的是他的自主和务实的实践精神。在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经济状况并不充足的条件下，真是“学名未得高官晓，所费低于欧客钱”（“洄溯吟”原注：全所经费不及部中欧人顾问），他利用各种合作、捐赠、援助等不同形式，积极而有效地把事业建立起来并且都能够跨越式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培养、训练出一批人才和做出了国际上一流的工作。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翁先生更有意义和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新生代和古人类学研究通过在周口店的国际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范例。周口店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和国际上第一流

的科研单位和著名学者们——加拿大、瑞典、奥地利、法国、美国和德国的专家们共同合作进行的。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其结果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已成为世界古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这不仅在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权威性方面，而且也在于从工作的一开始就从无到有培养出了第一流的中国自己的人才，如李捷、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卞美年、胡承志等，以及一大批采集、发掘、修理化石、制作模型和绘图、照像等第一流的辅助技术人才。因此才能在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周口店发掘受阻、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合作中断，在外国研究人员撤离以后，在新中国这些周口店培养的中国人自己，如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和后来的吴汝康、周明镇、刘宪亭等人的努力下，把周口店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不但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结果使得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地质调查所受到蔡元培先生称赞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sup>[2]</sup>，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李书华说“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sup>[2]</sup>。

从这些新学科和新机构在中国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创新和战略研究常常是不可分的。战略研究是创新的先导，而创新则是战略研究的果实。因此我们说翁文灏先生不仅是一位战略地质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自主创新的地质学实践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从翁先生对于古人类学和史前历史时期的关注和中国新生代地质（包括第四纪）的发展历史中所发生的三次战略性事件予以说明。

### 三、战略地质学家

在 1949 年 4 月的一天下午，在南京珠江路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礼堂里聚集了全所的员工们，在热烈地讨论解放大军即将渡

江，大家应如何保护好全所财产，迎接解放的问题。我从会议室出来到大楼后门口办事，忽然看见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门口（只有地质调查所自己人才知道这个在上下班时候才走的大门），进来一个人，原来是我们熟悉的翁文灏先生。

他走过来问我礼堂里在做什么？我说全所人员在开大会，讨论护所的事。他说“好”，“好”。我问他是不是要进去找所长？他说“不”，“不”，“不要了”，便转身出去上汽车走了。据看门的王珍说翁先生坐汽车在院子里绕了两圈以后才把汽车开出去走了。就在他走后不久，礼堂里的会还没有散，就听到从离所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明故宫飞机场，不断传来“轰轰”的飞机起飞的声音。大家都在说，这恐怕是撤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最后一批了！猜想刚刚来过的翁文灏先生也在其中吧！

作为地质调查所的一员，在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解放的时候，亲自看见我们地质调查所的创建人，在匆匆地离开南京以前，来到自己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的大楼办公室，看看亲自聚集起来的图书馆、亲自搜罗的标本陈列馆，和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及用膳的食堂的小楼，做一次难以说明的告别的时候，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情。难道声名赫赫的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真的就这样无奈地离去，永远地离去了吗？虽然我和翁先生仅有这么一次短暂的接触，而在这一次几分钟的接触中我确实感受到了翁文灏先生对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地质科学和地质调查所的深厚的感情，和人类抉择自己命运之艰难。

留在我心中的那些沉重的感觉，在读到了翁先生回国不久所写的一些论文和译作后完全改变了。我发现他真的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地质学了。我心中产生了对他的最大的敬意。

翁文灏先生自 1909 年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始学习地质学，到 1913 年回国从事地质教育与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到 1938 年离开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差不多连续工作了近 30 年，后来他在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仍在过问地质调查所的事情，所以前农商部矿产顾问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古生物标本和考古研究论文出版等问题仍从瑞典写信给经济部长翁文灏博士<sup>①</sup>。实际上他从 1938 到 1949 这 11 年中也并未从工作上和思维上离开地质学，所以于抗战胜利后就有“辞呈五次求归去，志趣终身避显夸”<sup>[4]</sup>之句，并且于 1949~1951 年回国前夕在法国“历访地质学诸老友”、考察铝矿和在英国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畅谈科技文化，并对李约瑟从中国古籍入手深研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浓厚的兴趣，为以后地质工作做了认真的准备。而在他回到祖国不久便于 1952 年以费伦乔的笔名给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寄去一份“北京市初期建设的要点”<sup>②</sup>。不知道这是不是新中国历史上除梁思成先生从建筑学的角度以外第一份来自民间的、从环境地质学角度为北京建设效力的意见书。这份“北京市初期建设的要点”不仅仅是一份科学研究论文，而是一个对祖国建设充满深情的赤子之心的表达。

这篇论文写成于学术界还没提出城市地质学和环境地质学之前许多年，是翁文灏先生从一个地质学家的视角，提出首都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划意见的文章。翁先生应该是我们中国研究城市地质规划的先驱。若从今天地质工作正在大力开展城市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并在许多大城市进行建设中的地质规划来看，翁先生当时的这一思想不仅是为祖国建设尽心，而实在是他一贯的地质研究和工作的思维的发展。虽然他当时没有给这一工作冠以城市地质的名称，但其内容则是以精确的道路的分布与绿色生态环境相结合，构筑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为基础，并从城市人口发展的时间角度对未来首都城市做了规划。令人惊叹的是翁先生当年这种以人为主线的城市时空三维关系的设计中所规划的道路和植树绿化，今天有的已经建设了，有的正在建设之中。这一预见性的研究虽然有些具体细节不见得和现代的研究相同，但这也丝毫无

---

① 见本《文集》126~167 页。

② 见本《文集》109~122 页。

碍于后人认识到他的地质思想的战略性及超前性,和具有把地质科学融入文化的素养和启蒙作用。

翁文灏先生在他的地质研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正是他这种作为一位战略地质学家对国家建设的参与。他于1917年即注意中国的煤、铁矿藏调查并参与规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一份地质战略研究。以后几年不断深入研究和发表了关于中国矿产的战略性文章。终于在1921年和丁文江先生共同概括为中国第一本《中国矿业纪要》<sup>[6]</sup>,成为研究中国矿产资源战略的基础与开端。到20世纪30年代翁文灏先生在《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sup>[7]</sup>、“中国地下富源的估计”<sup>[8]</sup>、“如何开发西北”<sup>[9]</sup>和“怎样建设内地”<sup>[10]</sup>等具有战略性的文章。当然他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担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以后,应是做了更多战略性的研究。

我们在纪念一位科学家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他的哪一篇论文,而是他的哪些事迹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翁文灏先生从事的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工作是承认地质学应不停留于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而更需要发展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或者说科学政策研究。这对我们今天的地质工作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从中国地质科学实践可以说明一个普遍的科学历史的真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在正确的方向上,是人类前进的一种力量。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学通. 书生从政——翁文灏.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1~329
- [2] 李学通. 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276
- [3] 戴光中. 书生本色——翁文灏传.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1~286
- [4] 翁文灏著, 翁心钧等整理. 洄溯吟. 见: 翁文灏诗集.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9. 11~32
- [5] 黄汲清. 为《翁文灏选集》写的序言. 见: 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家选集丛书. 北

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 I ~ XV

[6] 丁文江，翁文灏．中国矿业纪要．地质专报（丙种），第一号，1921，1~46

[7]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1932，（3）：9~12，（4）：  
10~13

[8] 翁文灏．中国地下富源的估计．独立评论，1932，（17）：6~10

[9] 翁文灏．如何开发西北．独立评论，1933，（40）：2~5

[10] 翁文灏．怎样建设内地．独立评论，1934，（124）：2~4

26/92  
/ 2007 6月25日

## 翁文灏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新生代研究 (代序 2)

《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主要的三篇论文“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和“旧史今识——远古—史前期”，写作于1953~1954年，时间相接，其内容也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代表了翁文灏先生晚年的地质学术思想的一部分。翁心钧、翁维玲和翁维珑等位为了使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文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搜集了翁文灏先生历年所发表的与古人类和远古文化有关的著作，以及一些珍贵的通信和文件，一并付印。这使我们能够在阅读《文集》的时候，体会到是在阅读一部中国的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因为有了这些来往的书信、对事态发展的记录，它使我们感到这不仅仅是历史，而且也是在了解现实，我们不仅和过去相沟通而且与现实在对话。我觉得读了《文集》之后，不仅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地质科学的关于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可以对这些学科的走向产生一个自己的判断。在今天我们一个新的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人们普遍地重视科学和文化互动的时代，翁先生的《文集》的启发在于它的深刻的现实感。

中国的地质学历史是由一系列的“地质事件”所构成的发展过程。在新生代地质的研究中有三个事件最为显著，它们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发展，甚至于其冲击波会延伸到科学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这些事件的发生和过程都与翁文灏先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发现这些事件对翁先生后来所写的这三篇论文的关系。现在试对它们加以讨论。

第一次带有全局性和长远影响的中国新生代研究事件是欧亚大陆草原环境的出现，即新生代“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国传统药材中有一味药叫“龙骨”。这是从古以来就用于外科止血和内科滋补的药材。中国人不仅发现了它的作用，而且还认识到它是一种和现代活着的动物很不相同的动物的骨骼。因为不明其种属，所以便以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能证实的“龙”来命名，把这些石化了的骨骼笼统地都叫做“龙骨”。

“龙骨”经过近代地质古生物学科学研究证明它是已灭绝了的动物的骨骼。如恐龙和许多哺乳动物，也包括了人的祖先在内。人们不仅能够从化石骨骼的解剖学特征说明它是哪一种动物的哪一部分，和它的生物演化的位置，并且可以根据地质学的规律说明它所在的地层的地质时代。

在北洋政府时代农商部请来研究矿产资源的瑞典籍顾问地质学家安特生 (J. G. Andersson)，虽然不是第一个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国“龙骨”化石的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广泛的收集者。他把所收集的大量化石请古生物学专家给予科学鉴定和出版研究结果。

在翁文灏先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期，对新生代地质和人类起源问题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视。他支持、协助安特生对三趾马化石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并建立中国第一个地质博物馆（当时叫做陈列馆）进行展示和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可以从 1923 年翁文灏所长给当时瑞典驻北京公使的信<sup>①</sup>，以及翁文灏、丁文江与安特生等人的来往信件<sup>②</sup>中得到确认。

据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说，当时安特生在山西、河南一带收购的“三趾马动物群”的化石，被运回瑞典的有几百箱之多。

---

① 见本《文集》131~133 页。

② 见本《文集》133~167 页。

对这批“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翁文灏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历史上的最大功绩是，使之由偷运变为公开化；使之从药材变为科学标本；使研究结果从私人记录变为公开出版的科学论文；使科学标本由私人收藏变为公开陈列的展品。这样一系列的科学处理，也科学地解决了化石标本的归属和主权的问题。

这是一次破除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努力。它使中国人由吃“龙骨文化”一跃而提升为现代文明的“生物演化文化”，而且通过公开陈列展览不仅仅是科学家，连老百姓也同样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这确实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件。因此当时许多人称赞地质调查所是最好的研究机构。

如果说，不是过分夸大的话，至少也可以说在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范畴内翁文灏先生和丁文江先生等人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国际合作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由此结束了帝国主义时代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科学文物的掠夺时代，而进入了一个准科学平等的时代、准平等的科学文化时代。这件事也可以从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地质学家和大哲学科学家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在 1929 年 4 月给他友人的一封信<sup>[1]</sup>作为见证。信中说：“当他 [斯文·赫定（Sven Hedin）] 于 1926 年即将去中国新疆的时候，遇到了关于科考材料上的中国人敏感的主权问题。但他是第一个接受他们（指中国人）所坚持的、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及研究的条件的人。他在当时备受责难，我可以肯定，他的欧洲的最好的朋友都责备他投降了中国人。正好在这时我碰到他并鼓励他相信中国人并和他们密切合作。所以像我所说的那样，他顺利地完成了漫长的（科学考察）工作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所以现在仍深情地感谢我当初对他所做的关照。”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可以从《文集》中斯文·赫定于 1926 年 12 月 7 日给翁文灏先生的信中请中国地质调查所对他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予以支持的信，以及安特生于 1926 年给翁文灏的谈关于科考标本的处理的信为证。这一个发生于 20 世纪地质科学界三大巨头之间的、鲜为人知的动人的历史故事

(事件), 给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关于科学标本的归属和处理问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而“三趾马动物群”的古生物学的重要性还在于, 不仅说明地质环境变化和生物演化, 并且还是一个从猿到人的最关键的时期, 这在翁先生的“人类进化史纲”<sup>①</sup>中已经做了预见性的论述。想翁先生这时不会忘怀当初他所经手过的那批世界少见的、极为丰富多样的“三趾马动物群”的启发。

第二个事件是在亚洲大陆揭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奥秘, 即周口店第四纪洞穴沉积的发掘和“北京人”化石的研究。《文集》中“人类进化史纲”<sup>①</sup>讲的是人类的祖先的起源、发展和进化的过程。这是翁文灏先生从很早就极为注意的极富战略性的科学问题。《文集》中重新发表的黄汲清先生在纪念翁文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对翁先生的功绩所做的阐述, 可以确切地反映这一工作,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文集》中把 1926 年翁文灏先生与协和医学院步达生 (Davidson Black) 教授的信函<sup>②</sup>, 以及这两个单位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sup>[2]</sup>再发表一次。它不仅说明翁先生对这一国际合作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且也树立一个成为后来许多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国际合作的样本。

虽然由于战乱, 最初一批“北京人”化石遗失后现在还未找到, 《文集》中刊出了寻找经过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澄清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情节, 但在以前对主要的标本都做了精确的模型, 无碍后人科学研究, 弥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能不称赞当时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和当时人员所受的训练的优秀。今天, 我国周口店遗址已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建立专门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翁文灏先生所做出的贡献。

第三个事件是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发现和史前考古学的出

---

① 见本《文集》1~30 页。

② 见本《文集》242~244 页。

现，即安特生在中国工作的后期对史前文化的考古地质研究。他在河南中原和黄土高原地区发现了中国的彩陶文化，并且从地层学的角度结合器物型态的研究对彩陶文化进行了分期。这一工作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次突破。

翁文灏先生对这一工作给予极大的注意。由于从当时称为上新统的“三趾马动物群”中可能有古人类出现，和与之时代相继的更新统“周口店早期人类化石”的发掘和“北京人”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统“史前彩陶文化”的发现所构成的在中国大陆上新生代以来三次地质生物演化事件的完整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的战略意义，使他对于在亚洲大陆最新地质的演化及其对全球地质历史的关键性、重要性，也就是从人类起源到文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科学意义产生了兴趣。这也可能就是 he 后来所著三篇论文的历史渊源吧！

在安特生开始工作时翁文灏先生就派了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青年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协助并向他学习史前考古学，后来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派在周口店工作的裴文中先生去法国学习和进修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虽然这项史前，和古史文化的研究由于安特生回国，以及遭受日本侵略破坏的影响，在地质调查所对这一研究未能全部继续下去，但在考古学界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近随着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和科技考古的进步，考古学又展现出新的趋向，地质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正在兴起，这也可以说是当年在地质调查所开始的史前考古的一种新的复兴吧！这也反映出整个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裴文中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试图进行一次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现代，人类起源、人类文化发展的研究，也由于环境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出翁文灏先生当年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从地质历史、人类起源与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明、人类文化融合起来的思想的轨迹。翁先生这一系统性的从人类最早起源开始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观和历史观，不仅对地质学